

七国集团新拉起的“多边主义”

廖省·林越

6月中旬,拜登到英国和欧洲走了一趟,和一班弟兄开了“多边”会议,包括G7、美欧峰会和北约峰会,这些会议有个共同点,就是如何对付中国。拜登在G7峰会上提出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北约峰会视中国为体制挑战,直指中国带来“系统性挑战”。

但欧洲各国幕后争议不断,认为不应上纲上线。北约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多次点名中国,如果北约把手伸到太平洋,伸到中国,“威胁”的级数当然值得高度关注。美国务卿布林肯之前在确凿的证据前承认美国破坏“国际秩序”,中国外交部随即补充说:“美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在拜登这趟欧洲之旅,可见其一

鳞半爪。

《大公报》18日刊载《围堵中国:西方被自己的梦困扰》一文称,在特朗普任内,美欧关系跌至战后历史低点。首先是因特朗普对欧洲气指颐使,批评北约过时,一再威胁增加军费,令德法等盟国非常反感。美前国务卿顾问博尔顿离职后出书,爆料很多肮脏内幕。

其次,特朗普发起对欧贸易战,对欧盟商品征收关税;无视欧洲反对,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世卫、退出伊核协定等,致使美国与欧洲的裂痕不断扩大。拜登当选口号是“美国回来了”,如果欧洲不买账,美国要回到哪儿?此次拜登拉拢盟友,联手指摘中国,在涉港涉疆涉台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除了显示西方不放弃冷战思维,实际意义并不大。

《亚洲周刊》第25期笔锋的《七国峰会与北约制华虚实》评论:“拜登在七国峰会上不断拿中国来说事,背后另有玄机,因为明年美国就要期中选举,参众两院的竞争非常激烈,民主党若稍有闪失,就会失去两院当前的薄弱多数,总统将沦为‘跛脚鸭’。拜登的对策就是沿袭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展示强硬姿态,争取民粹的支持,以稳住国会。”

欧洲诸国都了解拜登政府的苦衷,要拿中国作为国内选举政治的靶子,让中国代受过是不断“鞭打的孩子”(Whipping Child)。这其实是拜登的“大外宣”,倘若“较真”则会深陷自欺欺人的泥淖。全球经济产业链中,欧洲极度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德国汽车业、欧盟空中巴士的最大市场都在中国,如果欧洲要和

中国脱钩,那无疑是自杀行为。

评论还说:“中国对于西方的各种诬蔑的言论与行为已经是忍无可忍,开始在法律上设置‘反外国制裁法’,让那些拿中国来当‘鞭打的孩子’的国家,都面对自己被鞭打的痛楚。国际舞台上已不再由西方强权发号施令,而要找回长期被美国抛弃的联合国精神。”

除了欧洲,拜登也在亚洲部署,美日澳印举行线上峰会,“四方机制”(Quad)领导人讨论技术层面的多边协作。拜登提出七项要点,指定以四国集团为基础,在印太地区建立民主政体领导的科技生态系统,形成能够代替中国5G的商业竞争性,在盟国间创建自由数字经济,限制中国在印太的地缘经济的参与度,建立四边

创新基金,并关注环境技术。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印度的新冠灾难暴露了美国领导的‘四方’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一文,称印度第二波的新冠疫情,打垮了其成为世界药房的雄心,也破坏了其在“抵制中国于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印度拖累了美国的部署。

伦敦大学学者阿维纳什(Avinash Paliwal)说,印度的疫情暴露了其“身为崛起大国的想法”与“履行承诺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印度的国际形象在不断超越自我……甚至连印度人,也误读(misread)了自己的能力。”这让自信的印度人愤怒了,于是多家印媒刊文反击,称“印度在四方机制中的位置取决于其对抗中国的力量,而不是抗击疫情”。

甚至叫嚣,“如果没有印度,四方机制将会死掉。”两国媒体在国际上激烈交锋。

拜登与欧盟不断强调是“民主国家的联盟”,但很多民众认为G7在疫情处理上毫无章法,没保护好人民的生命权,败坏民主的美名。美国迄今死亡60万人、英国死12多万人。七国人口总共约7亿,死亡超100万人,比起中国14亿人口,只死亡4千多人,对比悬殊。在抗议实例面前,西方怎么还有“道德民主”的底气?凭什么对中国说三道四?

长期以来,美国已习惯于霸凌强制、不择手段的“单边主义”,如今在几个“朝三暮四、横七竖八”的盟友陪衬下,想为自己插上“多边”的脸谱,让政论员都掩嘴窃笑。

印尼峇迪在战后的崛起,归功于两个人,即苏加诺和吴德宣——峇迪历史观察家英格·麦凯布·艾略特

推陈出新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吴德宣经历了一段从心灰意冷到重拾灵感的心路历程。苏加诺总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受到了非人待遇,这件事令他心烦意乱。看到自己崇拜而又敬重的人物竟遭受如此待遇,而他却不能为他做些什么,吴德宣的心碎了,意志日渐消沉。虽然家中的峇迪生产仍在继续,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毫无意义。他一蹶不振,退出了许多活动,特别是媒体关注的活动。这种状态持续了许多年。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当时任雅加达特区省长的阿里·沙迪京(Ali Sadikin)。这位被公众称为阿里兄(Bang Ali)的省长,德高望重,做事雷厉风行,关心民众,重视文化的保护和建设。1973年,他提议将峇迪服饰与西服一起作为男士的正式礼服,并倡导女士们穿戴民族服饰。这项政策使峇迪重新焕发出光彩,成为时尚流行物品。看到峇迪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吴德宣倍感欣慰,重新燃起了创作的热情。

吴德宣决心要做的事情,是不再局限于苏加诺的嘱托去发展峇迪,而是要创作出一种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又不会牺牲峇迪的哲学内涵和推陈出新理念的作品。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期以来,热爱他作品的人都是峇迪爱好者、收藏家和官员夫人,他们大多居住在雅加达。因此,他在雅加达需要一个地方,用来举办活动和展览他

的峇迪作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峇迪作品。他的朋友苏达马吉·达玛伊斯(Soedarmadji Damais)当时任雅加达博物馆馆长,得知吴德宣的愿望后,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伯母安妮·伊覃(Anne Idham)。安妮可也是一位峇迪爱好者,她非常欣赏吴德宣,从1950年开始就收藏他的峇迪作品。

吴德宣,苏达马吉和安可最后达成共识,要建造一个峇迪展馆,命名为“斯里哈纳”(Srihana),意思是“在那里应有尽有”。这个名字隐含的意思是在展馆里不仅可以亲眼目睹峇迪作品,还能了解峇迪和民族服饰的知识和信息。这样一来,“斯里哈纳”峇迪展馆除了展出吴德宣的峇迪精品外,还有来自日惹、井里汶、北加浪岸、图班和马拉拉的峇迪手绘作品。同时,也是一个了解峇迪来龙去脉、穿戴民族服饰和举行峇迪表演的地方。

然而,当时整个社会都受到现代化洪流的猛烈冲击,从而摒弃了传统文化艺术中诸多哲学内涵。譬如,一件关于峇迪的重大事件,就是阿里兄号召男士们将长袖峇迪衬衫作为正式的民族服装。这一举措促进了峇迪业的蓬勃发展,受到了社会大众和峇迪生产商的热烈追捧。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一意欲提升印尼本土文化地位的举措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就是将商业价值作为峇迪创作的首选标准,从而丢失了峇迪的哲学根基。

这种浮夸的峇迪现代风气,引起了吴德宣的不安。他批判道: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随心所欲地做峇迪,但高质量峇迪作品所需的创作环境却荡然无存。结果,大家制作出来的都是廉价的、用于出

峇迪大师——吴德宣(4)

■ 丝丽·辛达莎莉·伊斯坎达



吴德宣陪同苏加诺总统



吴德宣(右)陪同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

口、售卖给游客和穿一次就扔掉的峇迪。如今,印尼峇迪已徒有其名,我们只是站在祖先们的辉煌成就和鼎鼎大名之上沾沾自喜,得意非凡。”(Hardjonagoro, 1978)

实际上,除了提醒民众峇迪的文化内涵正在消退,吴德宣还努力寻找出路。他说:“我们对峇迪制作进行了各种技艺上的更新,但千万不要因为远离了自己的文化,导致峇迪文化的消亡。我们背离了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抛弃了许多我们与众不同的个性。然而我们忘记了,峇迪作为蕴含优秀哲学内涵的文化作品,仅凭技术上的进步并不足以支撑其地位。发展高品质的峇迪,需要教育,需要思考,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认识。各位峇迪专家必须愿意引领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前进。”(Harjonagoro, 1976)

吴德宣反复强调的事情,就是他称之为“推陈出新”(Nunggak Semi)的峇迪哲学。“Nunggak”一词源自“tunggak”,意思是柱子、树墩,而“semi”的意思则是生长、发芽和萌芽的意思。Nunggak Semi这个词组有了解旧事物,以便创造新事物的意思。这不仅指技术或表面上的创新,而且还触及到内在的感受。如果没有创造出独特的生活环境,这一点根本无法实现(Harjonagoro, 1978)。吴德宣将“推

陈出新”的理念作为峇迪创作的根基。不管印尼峇迪变得多么绚丽多彩多么时尚摩登,他都不会离开他的根,也就是爪哇文化。可能有人因此而断定吴德宣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但他坚决否认这一点。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的峇迪应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我不反对改变和进步。我只想寻求一个平衡点,一个艺术与技艺平衡发展的交汇点。”(Harjonagoro, 1978)

在各种场合中,吴德宣不断地反复强调推陈出新的思想。他一直在强调,一个不懂爪哇文化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峇迪艺术家(Bambang, 2002)。

吴德宣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作为一名艺术大师,他样样精通,无所不能。正如海伦·伊斯瓦拉(Helen Ishwara)于1998年6月在《精华》(Intisari)月刊中所写的那样:“像吴德宣这样的全才并不多见。他就是一个人

彻头彻尾的爪哇人,不仅深入研究爪哇文化,而且同时汲取其中的价值观并在现实生活中学以致用。自小爪哇舞蹈就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之后又潜心研究峇迪,后来还掌握了克利斯短剑术。”

在“推陈出新”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吴德宣的一种信念,就是在创作峇迪的过程中对文化有透彻全面的理解至关重要。这样的话,峇迪才不至于失去“灵魂”。在“推陈出新”的时期,吴德宣推出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图木润”(Tumurun Sri Narendra)和“古苏摩”(Kusumo Sri Narendra)。

为了庆祝梭罗国王苏苏胡南十二世(Hinggang Sinoehoen Kanjeng Soesoehoenan P. B XII)登基纪念日,吴德宣创作了这两种样式。以下是他对作品的剖析:

如果我们阅读古籍如《马打兰史话》(Babad Galuh Mataram)或其他,可以清晰地发现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以王宫为中心。古时候的王宫是宗教、政权、风俗习惯和文化的中心。印度教佛教对印尼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产生了诸多的影响。譬如,在峇厘,大多数居民都信仰印度教,那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都受到了印度教的深刻影响。而在爪哇,随着第一个伊斯兰教中心——淡目王国于十五世纪的建立,受到峇厘印度教影响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不得不退守王宫,日渐脱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为高高在上的、与大众文化泾渭

分明的王宫文化。

印尼独立后,王宫虽已不再是政治中心,但作为过去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中心,王宫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王宫现在的职能,是要在这长达数百年之久形成的鸿沟上搭建桥梁,让退守王宫里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回归本源。峇迪只是蓬勃发展的爪哇王宫文化的一小部分。从前,峇迪是用来修炼专注力和冥想的练习,如今已成为大批量生产的产业。许多来自王宫文化的峇迪图案至今仍光彩夺目,而这也正是王宫作为曾经的文化中心担负文化传播的职责所在。鉴于上述原因,正值苏丹苏胡南十二世(Sri Soesoehoenan P.B XII)登基32周年之际,我制作了两种峇迪样式:

1、图木润(Tumurun Sri Narendra)

象征着苏苏胡南苏丹家族世代与人民团结一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共同奋斗。

2、古苏摩(Kusumo Sri Narendra)

象征着希望苏苏胡南苏丹能够带领王宫及苏苏胡南大家族顺利过渡,从过去的岁月成功地走向独立和建设的新时代,谱写出一曲苏丹家族为国家和民族的兴旺而奉献的历史。(Hardjonagoro, 1976)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作者印尼文名:Sri Sintasari (Neneng) Iskandar。本篇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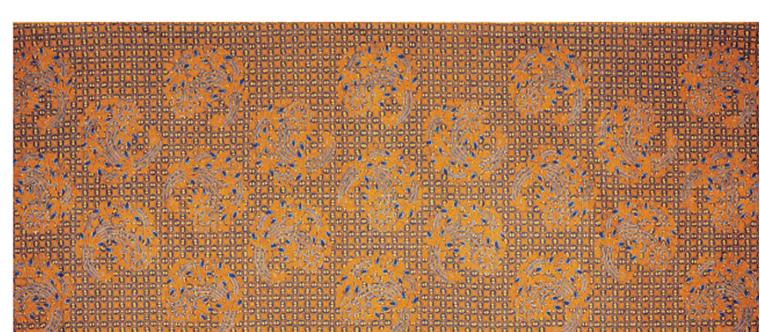


“图木润”峇迪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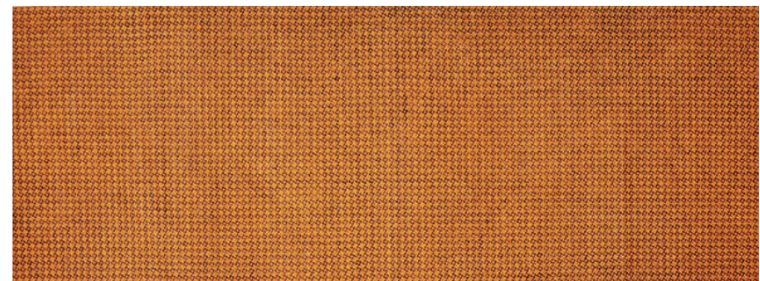
说我们的峇迪应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我不反对改变和进步。我只想寻求一个平衡点,一个艺术与技艺平衡发展的交汇点。”(Harjonagoro, 1978)

在各种场合中,吴德宣不断地反复强调推陈出新的思想。他一直在强调,一个不懂爪哇文化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峇迪艺术家(Bambang, 2002)。

吴德宣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作为一名艺术大师,他样样精通,无所不能。正如海伦·伊斯瓦拉(Helen Ishwara)于1998年6月在《精华》(Intisari)月刊中所写的那样:“像吴德宣这样的全才并不多见。他就是一个人



“古苏摩”峇迪作品



高贵的花图案

中国宇航
礼赞
占碑:
郭春明

载人神舟翱天穹,中华精英建勋功。此前落后惨凌辱,美俄垄断行不通。奈何龙人最争气,自研宇航走前锋。唯独中国太空站,落户仙国探秘宫。



漫画王锦松(原载《联合早报》)